

主持人语

近年来，各种类型的民粹主义和右翼势力在欧洲大规模崛起，欧洲的未来从未像今天这样具有不确定性。民粹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民粹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民粹主义在欧洲呈现出哪些特征？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原因有哪些？这些问题不仅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目光，更被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普通民众所关注。

此次论坛主题为“民粹主义、右翼政治与欧洲的未来”。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者就民粹主义的概念和特征、欧洲右翼政治、民粹主义与欧洲政治变革、民主与民粹等多个议题发表观点。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杨-维尔纳·穆勒教授探讨了什么是民粹主义者。他指出，并非对精英持批评态度的人就自动成为民粹主义者，重要的不是某种含糊的“反建制派情绪”，而是民粹主义的反多元主义倾向。民粹主义者自称是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他们并不能揭示客观的社会真相，只是在塑造人们的自我认知。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则从民主概念的历史演变出发，通过考察近代民主制度对古典民主理念的展现和对诸多非民主、甚至反民主成分的吸纳，强调民粹主义在本质上与民主原教旨主义并无实质差别，即都是在追求一种纯粹意义上的民主，拒绝现代民主的精英主义、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因素。

关于民粹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德国爱尔兰根大学于尔根·格布哈特教授认为，“人民”和“民族”构成了民主政治秩序的现代原则。伴随着“人民主权”在民族国家框架中的落实，民主精英们展现出一种固有的趋势，即自我指称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也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谈及的现代大众民主的平民-凯撒主义特征。

除了理论层面的辨析，民粹主义在欧洲的政治实践也是与会者研讨的重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冯仲平研究员直面“民粹主义会导致欧盟解体吗？”这一问题，指出当前欧洲民粹主义主要反对的是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难民和移民的到来。它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生态和政党格局，但是民粹主义政党上台后变得务实。当前阶段只是欧洲一体化的停滞期，欧盟虽面临困难但不会瓦解。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崔洪建研究员则试图解答欧洲民粹主义是一种解决方案还是一种政治退化，他认为民粹主义是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清算、对欧洲传统一体化路径进行质疑的结果。民粹主义以传统左翼的衰落为背景，或许是解决人们不满意、不安全、不高兴的方案，但抑或预示着欧洲将进入另一种政治分化的轨道。

巴黎第八大学依维·辛特默教授和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马可·塔尔基教授分别从左翼与右翼的角度对欧洲民粹主义的政治实践进行分析。辛特默教授表示，通常的民粹主义定义并不符合一些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理论与实践，而基础从劳工阶层到人民的转变，使得一种更具范式性的左翼政治成为可能。塔尔基教授则指出，民粹主义与极右翼之间虽有诸多共同点，且都被贴上后工业化时代法西斯复兴的标签，但是在政治文化、沟通方式、潜在选民、组织模式等方面，二者都有着显著不同。

从欧洲的整体状况着眼，与会者的讨论还涉及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原因、对后危机时期欧洲民粹政党发展趋势的判断、对民粹主义兴起的多元文化政策背景的观察。具体到不同国家，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孔田平研究员分析了匈牙利和波兰民粹主义政党上台后的情况，并从观念、制度和政策等层面探讨了它们与欧盟之间的冲突，认为这将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造成重大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王英津教授则以加泰罗尼亚公投为切入点，从法律、理论和现实的多重视角对之加以分析，并进而对作为民粹主义表征之一的分离主义运动作了讨论。此外，英国脱欧、德国选择党和意大利五星运动的崛起，中东欧民粹主义兴起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影响，也都是与会者广泛关注的问题。

天下论坛

民粹主义、右翼政治与欧洲的未来

2018年10月13—14日

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强教授在论坛开幕式上致欢迎辞。他表示，近年来民粹主义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在不少欧洲国家的影响力持续增强，在给这些国家的传统政治生态带来冲击的同时，也给欧洲未来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因此，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既具有理论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向论坛致贺信。他表示，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是一个国际化的学术平台和思想空间，也是一个年轻的学术机构，它肩负着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智库功能和对外学术交流等重要工作。希望通过此次天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推动欧洲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术繁荣。

一、什么是民粹主义？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杨-维尔纳·穆勒教授围绕“**How to Think and How Not to Think About Populism**”做主旨发言。他认为，在认识民粹主义时，首先要避免将民粹主义与反精英主义等同起来，民粹主义的核心是反多元主义而不是反精英。其次，与很多认为民粹主义主要是“反对运动”的观点相反，民粹主义者可以进行统治，他们往往通过“占领”国家机构、大规模的庇护主义、钳制社会的方式进行统治。最后，在应对民粹主义运动时，不应简单地将其看作某种社会阴暗心理或非理性的反映，而是应该认真对待民粹主义者提出的议题，同他们对话，但又不能像他们一样说话。

并非对精英持批评态度的人就自动地成为民粹主义者。重要的不是某种含糊的“反建制派情绪”，而是民粹主义的反多元主义倾向，其通常在两个层面作出排斥的姿态。一是政党政治层面，民粹主义者自称是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从而所有其他人至少在道德上都被排除在代表之外。二是人民本身层面，那些不认同民粹主义者对“真正的人民”所作的象征性构建的人，都被排除在人民之外。民粹主义者并不能揭示客观的社会真相，他们只是在塑造人们的自我认知。

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强教授从民主概念的历史演变出发，强调民粹

主义在本质上与民主原教旨主义并无实质差别。他指出，民主无论作为一种制度抑或一种观念均源于古希腊，其含义是人民的统治。不过，在古希腊以及其后相当长时期的思想家看来，希腊的民主是不成功的。近代以来形成的“民主”制度既体现了古典民主的理念，也容纳了诸多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成分。

首先，民主制度中的精英主义成分：混合政体的理念，如美国宪法中总统的职权和参议院的设立；代议制概念，麦迪逊区分共和与民主，用共和救治民主的弊端；政党制度，政党作为人民参与政治的中介；由精英控制的媒体。这些非民主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大大制约了“人民”直接主导政治的可能，保障了“民主”的制度化运行。其次，自由主义的成分：现代民主政治体现了民主与自由主义的结合，以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政治原则作为民主的前提。政府需保障个人以及由个人组成的群体，包括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不受多数意志的左右。第三，宪政，用成文的宪法和法律制约可能出现的多数暴政。

尽管现实运行的民主制度包含了民主以及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成分，但在理念上，至少从托克维尔起，以美国为代表的制度被简单概括为民主制度。这种情形在二战之后的政治话语中更为明显。二战之后西方的民主理论一方面强调在民主国家中人民的广泛参与，另一方面鼓吹非民主国家的民主转型。所有这些理论都包含一种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因素，似乎愈民主的制度愈先进。

这种民主原教旨主义在本质上与民粹主义并无实质差别。民粹主义的实质是追求纯粹意义上的民主，拒绝现代民主的精英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因素。

今天在思考民粹主义影响时应该同时反思当代民主理论的缺失，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重新考察民主的制度结构与理论原则。在承认民主作为现代政治核心价值的同时防止走入民主原教旨主义，借鉴麦迪逊以共和救治民主弊端的思路，以创新的民主理论直面民主面临的挑战。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海格·帕塔潘教授着眼于民粹主义者与古典的政治煽动家之间的对比，以此凸显民粹主义的内涵。他认为煽动家和民粹主义者都致力于相同的事情，即以引起不和的修辞，利用民主制度的弱点来实现自我扩张，而代价则是人民本身。但二者也有很大不同。一方面因为法治与宪政的巨大阻抑，民粹主义者弱于煽动家，另一方面现代性也赋予民粹主义者以新的概念和新的修辞技术（如“人民”“精英”“民族”“种族”“阶级”），使之更为强大。

二、民粹主义在欧洲

巴黎第八大学政治学系依维·辛特默教授以西班牙和法国两国的民粹主义政党为分析案例，探讨了欧洲左翼民粹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他指出，主流观点对民粹主义的描述有两个方面。第一，强调只有建制派是理智的，民粹主义者则总是被描述为通过大众非理智的思想来发挥作用。第二，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所有反建制派的民粹主义者都被不加区分地置于同一种负面的定义中，即反精英，反智，直接听从于民众的人格魅力型的领导风格，对现代价值观的误解，对统一社群的怀旧之情和仇外情绪，前后不连贯的言辞等等。然而，至少在谈及左翼民粹主义时，这些特征并不能很好地被归纳为统一的定义。雅克·朗西埃曾批判说，“民粹主义”不是一个用于定义某种意识形态的具体概念，而是一种用来轻视民众的观点：民众通常被描述为非理智的、情绪化的和具有潜在危险的个体的集合。

恩斯特·拉克劳提出了他对民粹主义的理解，认为政治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其修辞和效果，因此他用语言学上的“空洞的符号”概念来解释民粹主义话语的特征。正如很多不明确的、单一的意义却能令人在情感上认同的“空洞的符号”，民粹主义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逻辑的等价链以及政治情感化这一特征而发挥作用。“空洞的符号”往往使得话语所体现的社会群体和价值观更强有力。当今世界由于统治阶级无法满足不同的社会需要，社会分化进一步加深，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反对统治阶级的极化。左翼民粹主义反对金融全球化和此过程中形成的精英，右翼民粹主义则反对外来的种族和文化给本地带来的影响。

西班牙“我们可以”党和“不屈服的法国”运动是欧洲左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代表。他们的共同点体现在对全球资本主义和政治精英的激烈批判和对参与性民主制度和民主创新的提倡，都呼吁“平民的作用”。此外，一些创新性的吸引民众的言辞，也都表现出民众作为“空洞的符号”的特点。两个政党也有很多不同之处。“我们可以”党创立于2014年，源于马德里知识界左翼发起的一场政治运动，以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为诉求。“不屈服的法国”运动则是从政治精英阶层中发展而来，依靠魅力型领袖的组织和领导及其类似于煽动家的方法和行为。“我们可以”党支持难民，“不屈服的法国”运动则是反难民的、具有排外倾向。

综上所述，主流观点对民粹主义的批判是对非理智的民众的批判和对理智的

精英的拥护，忽视了政治本身所蕴含的修辞学的和情感的维度，以及社会和政治的“正常”关系。其次，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存在巨大差异，要加以区分。最后，类似于西班牙“我们可以”党这样的民粹主义政党应当如何应对来自传统欧洲左翼的挑战，即如何将新的社会运动与政治体制内的变革联系起来，也非常值得思考。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研究员试图通过分析欧洲民粹主义的源起及发展前景，回答“民粹主义会导致欧盟解体吗？”这一现实问题。他认为，民粹主义的兴起都是源于对精英集团和建制派的严重不满和不信任，这也是所有民粹主义的共性。但另一方面，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民粹主义所反对的内容并不相同。当前欧洲民粹主义主要反对的是欧洲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及外来的不同宗教信仰的难民和移民。

欧洲左翼民粹主义声称其代表的是穷人，对立面是富人；右翼民粹主义强调的是“我们”与“他们”，即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身份差异和文化差异。但无论“左右”，都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欧洲战后推行的一体化建设走得太远了，经济全球化搞过头了。他们提出的主要诉求是重新强化国家主权，反对开放，反对超国家治理。比如英国要求拿回边境管理权，法国国民联盟（前国民阵线）要求拿回货币主权，退出欧元区。

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并不会是昙花一现，未来 5 至 10 年将继续成为影响欧洲政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一，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产生发展的土壤不会很快消失，欧洲贫富分化、失业人口、难民等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其二，欧洲传统主流政党虽承受着巨大压力，但迄今为止，面对风起云涌的民粹主义苦无良策，拿不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然而，目前欧洲各国的中间政党面对同样的问题也陷入了困境。尽管法德等大国仍是传统主流政党执政，民粹主义政党单独上台或组阁的情况较少，但这一局面未来是否会有变化将取决于传统政治力量和民粹主义力量激烈博弈的结果。

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欧洲的政治生态和政党格局已然发生重大变化，工业化时代形成的左右翼政党格局受到冲击。一些民粹主义政党进入议会成为反对党，这意味着今后欧洲国家乃至欧盟层面的对内对外政策会无一例外地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但总的来看，欧洲民粹主义的主张反映的是一种变革而非革命。因此，

欧盟未来不会解体，现阶段的欧洲可以看做是欧洲一体化的停滞期而非走向瓦解期，但同时，欧洲一体化面临的障碍及阻力会越来越大。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国家开展合作，将很可能成为未来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途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探讨的问题是“欧洲民粹主义是解决方案还是政治退化？”他认为，2009 年以来，欧洲经济、安全和社会问题叠加为政治民粹化提供了温床。反全球化、反一体化和国家主义回归，被一些国家视为应对危机状态的政治解决方案，并在地方、国家和欧洲一体化三个层面出现互动与共振，以致于民粹主义已部分进入主流政治并得到容忍。

目前欧洲很多国家出现了试图以直接民主取代代议制民主的趋势，具体现象可以归纳为三个“U”。一是欧洲人民对现状不满意（Unsatisfied）。不满发展下去会变成对现有政体及治理方式的不信任，从而成为一种公共情绪。二是欧洲人感到不安全（Unsafe）。一些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产生了很严重的失败者心态，因为感到不安全而要求得到保护，这种现象反映在欧洲一些极右翼政治中。三是欧洲很多年轻人不高兴（Unhappy）。比如法国的极左力量主要是年轻人，而在瑞典这个左翼长期执政的国家中，年轻人的不高兴感也很强烈，进而会发展成愤怒。从民众情绪和认知的生态看，民粹主义的产生有着很深的社会基础。

从政治治理的角度看，欧洲目前的民粹主义趋势首先应归咎于传统主流政治的失误。在 2009 年之前的几十年中，欧洲在高速发展中却没有解决好一体化及其自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其内部出现一定的阶层固化和政策僵化。一方面欧洲政治缺乏活力，极端表现是德国；另一方面治理结构呈现扁平化，很多国家政府越来越小，政府与其他领域的界限越来越清晰。民族国家权力不断被分走，向上转移到一体化层面，向下转向地方自治。上述情况造成中央政府在面对很多问题时缺乏治理能力。

从社会层面看，一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失败者心态被政治精英利用，他们有意地将国内治理的一些矛盾向外转移，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心态。另外，欧洲目前存在深刻的代际矛盾。“一体化的一代”开始有投票权，一些经济有问题国家的年轻人认为本国在加入欧元区后并没有得到好处，反而不断在失去，他们认为一体化过程中主权的转移是失败和不能接受的。

从技术层面看，网络技术给欧洲带来的最大挑战，是知识和信息的分布和传

播趋于对称，动摇了精英政治重要的基础。更多的普通民众认为他们也可以更积极地参与到政治中去，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欧洲政府的政治参与方式和组织方式发生变化，传统的政治组织形式在网络时代凸显落后。

崔洪建认为，一旦民粹主义思想随着执政党进入政府，一定会对政策产生影响。首先，它会带来一种短期行为或者及时获利的政治冲动。其次，此前大家达成的共识或现有的交往方式会发生改变，比如对国内原有的公正程序产生质疑。第三，民族主义国家是会互相塑造的，如果每个国家都强调“自我优先”，就有可能产生冲突。

面对全球层面或地区层面的新一轮变动，民粹主义在很多政治精英或民众看来似乎是一种解决方案，可以解决上述三个“U”，但这种改变的愿望和政治操作之间是有距离的。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克龙在法国的改革现在出现了矛盾。由此可以思考，这一波民粹主义只是一个应急的解决方案，还是它预示着此后欧洲政治将进入另一个轨道？

三、欧洲右翼政治

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马尔科·塔奇在分析民粹主义势力和极端右翼势力时指出，尽管二者存在很多关联——曾被视为后工业社会中新法西斯主义的两个侧面，但两者在政治文化、沟通方式、潜在选民和组织模式等许多领域仍存在较大差异，应按照不同政治阵营的成员对其区别研究。

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后，一系列欧洲国家的选举结果使一些学者相信，新一波民粹主义潮流和新政治力量已经出现。但实际上，由于民粹主义势力或极右翼政党之间缺乏共同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纲领，因此没有组成议会党团，这表明所谓的新政治力量尚未形成。并且整合这些政治集团的诸多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也反映出这些政治势力对欧盟内部问题的厌恶仍不足以掩盖他们之间的本质差异和政治猜忌。

由于对民粹主义的新形式及这些政党胜选原因缺乏认识，很多人将民粹主义与极端右翼归为一类。事实上，目前的民粹主义不应被视为极端右翼在后工业时代的变体，二者存在五点不同。

第一，对社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存在分歧。民粹主义认为国家应服从社会大众的需要，应受到社会的限制，极端右翼则将国家视为指引和领导人民的不可或

缺的工具。第二，以上分歧导致两者对国家功能持不同观点。极端右翼认为国家是实施侵略扩张的基石，民粹主义则采取孤立主义的立场，主张国家的意义在于防止外国资本、商品和劳工的侵入。第三，二者对个体地位的认识存在差异。民粹主义认为个人是社会生活的支柱，极端右翼则认为个体位于国家之下。第四，二者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认识存在分歧。极端右翼更愿意追溯历史的黄金时代，民粹主义则更加务实和有选择性。第五，二者虽然存在继承关系，但在诸如同性恋、堕胎、离婚等道德话题上存在较大分歧。民粹主义认为自上而下的公投和立法行之有效，极端右翼则对此疑虑重重。此外，民粹主义者从来不拒绝民主制度和基本的民主价值观，他们只是口头上的极端主义，却不愿用暴力来实现自身的目标，极端右翼则恰恰相反。

然而，困难之处在于民粹主义和极端右翼往往为了选举采取伪装以形成迷惑，去法西斯化的极端右翼也会假装成去右翼化的民粹主义者。因此，很多分析家常将极端右翼与民粹主义进行联系，产生“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概念，还出现了“非激进右翼民粹主义”和“非民粹主义右翼”的划分。总而言之，尽管存在概念的联系和混淆，但民粹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心态，即将人民视为一种有机体，通过发扬其道德品质，以现实主义、勤奋和正直对抗伪善、低效和社会堕落。声称人民的权威是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人民大众凌驾于一切公共权力之上。只有在这种定义的基础上才可以将民粹主义与极端右翼进行比较。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孔田平研究员通过匈牙利和波兰两国的案例，从观念、制度和政策三个层面分析了中欧民族民粹主义的崛起及与欧盟的冲突。

自 2010 年匈牙利欧尔班领导的青民盟执政以来，匈牙利致力于建立所谓的“非自由民主”。2015 年 10 月法律与公正党赢得波兰大选，成为执政党后开始限制宪法法院的独立性，强行控制司法机构，围绕法治问题与欧盟公开发生冲突。英国脱欧公决后，匈牙利和波兰希望留在欧盟，但强调欧洲需要一个松散的非集中化的欧盟。

匈牙利和波兰政权的合法性毋庸置疑，均为民主选举产生；两国并未取消多党制，在野党继续合法活动，批评政府的政策；虽实行强人之治，但其治理并不僵硬，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两国的经济政策也相应发生变化。匈牙利已经偏离 1990 年以来主流的经济转轨路径，对一些战略性资产实行国有化，并加强国家

在经济中的作用。波兰改变经济政策，强调经济爱国主义，削弱外资银行和跨国公司的地位，强调战略性部门控制在波兰人手中。

匈牙利、波兰与欧盟的冲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民主与法治之争。青民盟执政以来，匈牙利开始限制独立机构的作用，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以不同的方式介入，以阻止匈牙利的“民主倒退”。2015年11月，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政府上台，其与宪法法院的冲突引发了欧盟的高度关注。2017年1月，波兰政府宣布将进行全面司法改革，欧盟委员会认为，此举意味着司法体系将受执政多数派的政治控制，在缺乏司法独立的条件下，有效实施欧盟法将面临严重的问题。

其次是应对难民问题。2015年以来，近百万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在难民危机上，新老欧盟成员国的认知差距凸显。德国等国曾视难民为机遇，而新成员国则视难民为威胁。波兰卡钦斯基2015年在议会选举竞选期间，公开称移民为欧洲带来霍乱和痢疾等疾病以及各类寄生虫和原虫。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认为，难民危机一直作为经济和文化问题进行应对，而由于恐怖主义的威胁，移民问题成为了公共安全问题。欧尔班认为难民配额正在重构匈牙利和欧洲的族群、文化和宗教形象，他称匈牙利所为并非反对欧洲，而是在捍卫欧洲民主。

第三是欧盟未来之争。英国脱欧公决后，欧尔班认为这可能是欧盟最终解体的征兆。卡钦斯基认为，理想的欧洲不是联邦，而是松散的邦联。波兰提议修改欧盟条约以加强民族国家，消除各种独断专行。2017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未来白皮书》，提出2025年之前欧盟发展的五种选项，其中“多速欧洲”为选项之一。波兰、匈牙利等维谢格拉德国家对此强烈反对，理由是此举有可能进一步边缘化其在欧盟内部的地位。

冷战结束后，欧盟为扩大设定了哥本哈根标准，其中政治标准为保障民主、法治、人权，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制度稳定。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应当视为达到了哥本哈根标准。此后，随着欧盟的约束减弱，中东欧国家出现改革疲乏症，转型之初的政治共识逐渐消失，部分政治力量开始挑战哥本哈根标准。欧盟并无监督新成员国民主和法治的机制，面对一些国家的变化，欧盟一度无所适从。对于冲突，波兰和匈牙利认为，这是欧盟与成员国的权能之争，司法是成员国的专属权能，欧盟无权干预。欧盟则认为是价值观之争，匈牙利和波兰削弱民主，动摇法治，侵蚀基本权利，破坏欧洲团结原则，对作为价值共同体的欧盟构成威胁。

匈牙利和波兰均自称欧洲现实主义者，有观察家将两国与欧盟之争称为欧洲现实主义者与欧洲自由主义者的对垒，目前双方进入了摊牌阶段，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将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史春玉副教授在发言中对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前国民阵线）进行了解读。

据介绍，极右翼势力在法国最早可追溯到第三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狂热民族主义者布朗热分子和 19 世纪末反犹太人的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法国行动党。不过，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这些政党或组织的政治影响力相对有限。国民联盟成立于 1972 年（最初为国民阵线，2018 年 6 月更名），其目的在于整合法国极右翼势力，对抗走向联合的左派，并试图在立法和总统大选中提高影响力。

玛丽娜·勒庞于 2011 年开始执鞭国民联盟，由此开启了该党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玛丽娜·勒庞的目标是摆脱该党作为法西斯政党的公共形象，将其打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值得尊重和信任的、有执政合法性的政党。不过，从本质上看，国民联盟仍然是一个威权型民族-民粹政党，它在某些社会问题上的一些开放性和现代性观念表达（如同性恋和女性权利保护问题）不能改变其极右翼本质。其意识形态中依然充满了排外主义、民族-种族主义、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认为，社会分为相互对立的两大群体，即“纯真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政治就是人民意志对完全脱节的人民真实渴求的民主体制的抗议表达，应该抛弃运作失败的传统政党和政治制度。国民联盟谴责国家的政治生活日益堕落，他们自我宣称是代表人民真实意志、反对精英的政党，是真实民主的捍卫者。这种政治形象的塑造通过一些政治口号得到传递，如“玛丽娜·勒庞，人民的声音，法国的精神”。玛丽娜·勒庞甚至毫不避讳地自称民粹主义者。

国民联盟的经济政策也逐步呈现典型的民粹主义特征。围绕着全球化议题，该党构建了“大人物”与“小人物”之间的敌对关系。大人物是掌权阶级、欧盟、金融界、国际大企业、超级富豪等等，小人物是工人、农民、小商人、手工艺人、普通公务员和职员。玛丽娜·勒庞逐步公开表达她对自由主义经济的反对，对国家主义和干预主义政策的支持，试图在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构建反对全球化的经济保护主义政策。

和老勒庞时代相比，国民联盟摆脱了曾经的边缘化地位，日益走向正规化、

职业化和强大化。目前尚难以预测该党在 2022 年乃至 2027 年的全国大选中是否有可能成为执政党，也难以预测它和法国右翼在全国层面结盟的可能性。在未能上升为全国性执政党的情况下，其对法国政治和欧盟政治，特别是相关的国内、国际重要决策的实际影响相对有限，但也不排除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首先，国民联盟会继续鼓吹其民族中心主义、反移民、反伊斯兰的意识形态主张，并在其执政地区将这些主张转化为具体的地方政策，对法国国内日趋紧张的族裔之间的敌对和冲突情绪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在国内社会安全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国民联盟的威权主义社会治理风格将会继续对执政党、法国右翼乃至公共舆论施加压力和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Matthias Hackler（何铭）的发言聚焦德国选择党的政策演变及其政治前景。

德国选择党成立于 2013 年。当时，德国部分民众对创立欧元区和德国政府在欧债危机中的救助政策早有不满意，选择党因其在这一问题上不同于传统党派的态度而吸引了许多“抗议选民”的支持。随着欧洲难民危机的加剧，德国民众对欧盟的难民政策日益不满，这让选择党看到了发展机遇。其在 2016 年颁布的《基本纲领》中强烈反对大规模移民，抵制伊斯兰教，明确宣称“伊斯兰教不属于德国”，同时强调德意志的民族身份、传统的家庭观念，提出发展“德国主导文化而非多元文化主义”的口号。选择党逐渐从一个因欧元问题而建立的政党转变为一个宽泛的右翼民粹平台。

在 2017 年通过选举进入州议会与联邦议院后，选择党一方面在议院工作中将议题范围缩小到国内安全、移民问题和伊斯兰教等几个领域，并经常使这些议题与其它问题无端关联。另一方面，在议院辩论中常常采取哗众取宠的表达方式进行政治挑衅，通过触犯政治禁忌获得更高的关注度，这也使得已有的“保守主义”越来越带上“右翼极端主义”的色彩。

与此同时，选择党自身的二元结构问题日渐凸显。党内的根本分歧来自于务实派和激进派之间的紧张关系。代表市场自由主义的德国西部务实派希望在 2021 年参加政治联盟，向政治中心靠拢，而德国东部的右翼保守激进派则对“旧政党”和民主制度持怀疑态度。表面上看，这种二元结构问题使得选择党不具备发展潜力，但也有分析认为，正是这种二元结构使该党能最大程度地吸纳对政治

和社会现实不满和失望的民众，从各个政党手中夺走选票。

如果选择党将 2021 年执政作为下一阶段政治目标，那它将面临诸多考验。从内部看，在议题上对难民问题、伊斯兰教问题的依赖性太大，缺乏议题创新能力，强烈的议题依赖性导致党内政策分歧日益突出。如果能消除党内分歧，调整社会政策，避免言论继续极端化，保持其保守主义的核心立场，选择党就有机会在州议会和联邦议院中站稳脚跟，从而削弱甚至挑战基民盟的统治地位。相反，如果进一步民族主义化，党内右翼保守派与自由经济派的关系会更加恶化，选择党会因失去党内平衡而重蹈之前小保守党派分裂与衰败的覆辙。

四、民粹主义与欧洲政治变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董一凡对后危机时期欧洲民粹政党的崛起及发展趋势进行了阐述。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民粹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态势。首先，遍布欧洲，全面开花。西欧、中东欧、南欧、北欧国家均涌现出具有较大影响力且跻身本国议会前三大党的民粹主义政党。其次，登堂入室，进入体制。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各国作为执政联盟参政甚至主政已成为常态。第三，左翼和右翼均出现“民粹生态”，甚至界限模糊。第四，对欧盟权威发起前所未有的挑战。各国民粹主义政党的政策主张大都基于对欧盟机构及其政策产生的不满。

民粹主义反对精英和建制派的传统主张与理念，以各种形式对现行体制发起反抗，其主要动因是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给中下层民众带来的负面效应。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经济经历了从剧烈衰退到逐渐复苏的过程，进而带来政治、社会、文化认同生态的变化，为欧洲民粹主义“野蛮生长”创造了环境。

首先，传统政治力量正失去市场。欧债危机后，欧洲中左翼政党无法就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拿出效果显著的解决方案，在中右翼“自由市场+小政府”及民粹主义政党的夹击下呈现式微。传统政党为了和民粹主义政党竞争，政策主张纷纷向着极端方向看齐，自我改造的同时朝着更左或者更右的方向发展。

其次，民粹主义政党也在向主流融入。传统政党在移民、欧盟等政策上整体右转的同时，民粹主义政党为了执政，也部分放弃了不现实的激进主张，向着主流政治的方向靠拢。

第三，民粹主义严重迟滞了欧洲一体化进程。欧洲一体化归根到底是各国向

超国家机构让渡主权，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治理领域政策整齐划一的进程，从根本上与民粹主义鼓吹的“人民自主”和民族国家框架下的“秩序重构”相冲突。未来，欧盟各国在移民、欧元区、自贸协定、对外政策等方面矛盾将更加凸显。

最后，民粹主义将刺激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政党打着“传统政客无能，不如另一种选择”的旗号，迎合民众不满情绪，给予欧盟及各成员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以更大压力和掣肘，进一步挑动民众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等议题的反感。欧洲政治普遍出现“向右转”、被民粹主义裹挟及民族主义和“本国优先”、“要求更多保护”等倾向。从传统建制派角度看，他们需要反思和回应民众的不满情绪，与民粹主义争夺支持率，而经济保护主义则回应了民众要求保护就业、产业等方面的诉求，将民众对其他内部事务的注意力和不满情绪转向“外国人”。从欧盟层面看，近年来多重危机使各成员国之间在难民、财政预算、欧元区改革、对外关系等方面矛盾不断，民众对欧盟的疑虑与日俱增。由于贸易政策是为数不多由欧委会层面掌握的政策领域，欧盟也有刻意为之之嫌，即通过在该领域的主动作为彰显其机构作为，给予民众“保护其利益”的印象，以重新获取民众信任。2016年，在欧盟大肆炒作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期间，“五星运动”等党派就曾在布鲁塞尔举行所谓反对中国钢铁产能过剩的活动，显示民粹主义政党在欧盟的保护主义背后推波助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讲师刘力达从民族主义、政治危机及选民分野的角度分析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

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由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复杂性和变动性，对其使用的概念纷繁复杂。但实际上，因其一方面坚持保守主义的社会文化价值趋向（“右”），另一方面主张大政府、福利国家、保护主义等经济政策（“左”），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已无法用传统的“左”、“右”予以归类。

要看清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本质，应从“民族主义”入手。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主张多聚焦反移民议题，这表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家族的核心意识形态是“族裔民族主义”，即政治共同体的边界应与血统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的边界保持一致。正是出于这一逻辑，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或者民族自治区）的边界外反对高于它自身的政治体，在边界内反对异质的社群（移民或世居少数民族），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也多由带有血缘、排他性和原

生性色彩的族裔民族主义衍生。因此，“右翼民粹主义”的“右”是一个程度性、残缺性概念，随着族裔民族主义色彩的增多而趋强；有反移民、反欧盟主张的政党由其族裔民族主义色彩的轻重可归为不同程度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既有研究从政党政治选举市场的供给-需求模型切入分析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供给因素包含所有在选举市场创造开放性的政治和制度机会，例如选举系统、政党结构关系（又叫政治机会理论）。需求因素包括导致怨恨或不满意的客观情况，例如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转化、结构分野等（又叫怨恨理论）。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供给因素涉及欧洲各国具体的政党结构与互动、国家整合模式等。以法国国民联盟为代表的族裔-国家民族主义政党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主流政党在移民问题上的合流极化，为右翼民粹主义的排斥性民族主义主张提供国家化和合法化“背书”，但事实上又不能完全实施超出驱逐非法移民之外的、针对法国少数族裔移民的强硬手段；同时，欧债危机导致的经济问题凸显，也使得阶级矛盾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呈现。对于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者而言，民族主义政党象征的是坚持真正的“民族国家”——对外捍卫民族的主权不被欧盟和全球化侵蚀，对内捍卫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不被人口和文化的日益多元化所消解。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需求因素主要是欧洲政治的结构性变动，表现为民族国家危机、代议制民主危机、福利国家制度危机以及意识形态危机。欧债危机以来，上述四个方面所遭遇的问题相互作用，多重矛盾进一步激化，使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需求因素陡然增加。

欧洲该往何处去？是按照韦伯式的从各自民族角度出发的特殊论，还是施密特的大空间理论，抑或是哈贝马斯的宪政爱国主义普世论，人们惘然若失。至少，反欧反移民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表明，欧洲并未完全身处后民族结构中，而是一种正在建构进程中的民族和后民族混合结构。以基于宪法、规则和公民权利的宪政爱国主义建构欧洲公民团结、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方案或许存在本质性缺陷，这一抹去文化、历史、传统的抽象设计始终难以抵挡现实中族裔民族主义的冲击。对欧洲而言，民族性政治实体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是一个帝国林立的时代，一个跨国性的政治统一体的时代，不过这些统一体仍然要由加盟的民族国家来构成。如何与民族主义相处，是欧洲乃至其他共同体在建设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命题。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后何晴倩从文化角度对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因果效应进行了分析比较。她表示,通过比较分析全球化文化抵制和现代化文化反弹影响民众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偏好的因果效应,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更应归结于全球化文化抵制而不是现代化文化反弹。

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何获得支持的现有研究中,从选民角度看,主要有全球化文化抵制论和现代化文化反弹论两大解释。前者认为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源于全球化过程中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后者则更多地强调西欧社会中传统保守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文化价值观所进行的抵制。

全球化文化抵制理论主要基于社会学的社会身份理论。社会身份理论认为个体具有区分“自我”和“他者”的天然能力,他们趋于与自己类似的个体建立联系,形成凝聚力的同时也趋于认为“自我”所在的群体优于“他者”所在的群体。该理论因此认为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蓬勃发展正是得益于“自我”在面对越来越多“他者”时所产生的文化和身份的受威胁感。

现代化文化反弹论同样强调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文化因素,但与全球化文化抵制论强调外来移民的文化冲击不同,现代化文化反弹论更多地关注西欧各国内部的文化价值观演变,即从传统强调生存和秩序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强调个性和自我表达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演进。

基于 2014 年欧洲社会调查数据,采用匹配的因果推断方法,分析全球化文化抵制和现代化文化反弹影响民众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偏好的因果效应。结果显示,在对匹配数据进行简单均值差异比较时,在认为文化受到移民威胁的群体中投票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人数占比大于在不认为文化受到移民威胁的群体中投票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人数占比,差异为 0.038,并且在统计上高度显著;在持传统保守主义价值观的群体中投票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人数占比大于在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群体中投票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人数占比,同样在统计上高度显著,但这一均值差异只有 0.031。在对匹配数据施加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时,文化受移民威胁感对民众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偏好的影响在统计上高度显著,其发生率为 1.034。传统保守主义价值观取向的影响也同样高度显著,但其发生率只有 1.023。

综上可以得出结论,文化受移民威胁感和传统保守主义价值观取向在当代西

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蓬勃发展中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但前者的影响力要大于后者。无论是通过均值差异比较还是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的发生率比较，前者对民众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偏好的影响都强于后者。由此，当代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更应归结于全球化文化抵制而不是现代化文化反弹。全球化过程中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冲击是当代西欧各国民众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首要原因，相反，更广泛的自由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反弹并没有学界想象得那么严重。

五、民主与民粹

德国爱尔兰根大学政治系教授于尔根·格布哈特的发言主题为 *We the People: Popular Sovereign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Democratic Principle*.

他认为，民粹主义运动只是困扰欧盟的各种冲突的征兆之一，这些冲突损害了欧洲的统一，加剧了民族认同政治的离心力量。民粹主义也是整个跨大西洋世界重新主张民族主权的趋势的一部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民粹主义者对作为一种政治主导模式的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挑战，而在于民众政府甚至是民主秩序概念本身面临的困境。因此，有必要追溯民主的历史起源和构成现代民主政治原则的基本概念——“人民”和“民族”。由于“人民主权”的潜在意涵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实现的，民主精英会展现出自我指涉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内在趋势，这是马克斯·韦伯谈及现代大众民主“大众动员-凯撒主义”特征的原因。

1649-1789 年间大西洋两岸的民主革命试图在政治上实践一种新的秩序愿景，它建立在人民主权和民族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则上。在英国革命中，国王的神圣权利被人民的神圣权利取代。在美国革命中，“人民至上的伟大共和原则”最终体现为一种新颖的代议制民主。主流社会科学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源于美国的政治现象，这一术语及其含义起源于 19 世纪末作为美国政治第三党的人民党。美国民粹主义者是作为一种政治替代项的直接民主的前驱，且民粹主义政治在美国是一股活跃的力量，可以达至国家政治的最高层级，最新例证是 2016 年的总统大选。代议制民主在美国的持续成功运转，吸纳了潜在的民粹主义要求的直接民主根基，也提醒了统治精英，国家权力应直接来自人民。

对代议制民主的最终挑战出现在 1789-1804 年间的法国。1789 年革命后，法国经历了一系列宪政实验，权力斗争伴随着人民主权观念的显著形变。雅各宾派用革命政府取代议会的代表专制，并视民主专政为人民意志的真正解释者。不

过，民主原则的革命潜力在拿破仑·波拿巴的民主凯撒主义中达到了顶点，他频繁诉诸全民公决来赋予自身发动政变、谋求终身执政及加冕皇帝的行动以合法性。大众动员式-凯撒主义，成为实现民主原则的第三种形式。

《独立宣言》中“我们人民”宣告了体现在民主观念中人民神圣权利的历史愿景。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反复兴起的民粹主义一直是事关民主原则的权力斗争中最为喧嚣的斗士。这场斗争现已遍及全球。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达里奥·卡斯蒂廖内对“人民的统治和现代议制的权威”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

他的发言聚焦近二、三十年崛起的新民粹主义，特别是党魁、政党和民粹运动在表达政治诉求时使用的若干关键语言模式和修辞策略。在新民粹主义的话语中，人民的统治或人民的意志占据核心位置。人民的意志被视为现代政府特别是当代民主政体合法性的根本来源。新民粹主义者使用这一话语时，一方面批评建制派凌驾于人民的统治之上，或者滥用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也希望摒弃那些干预多数决原则的制度设计，排除少数族裔、移民群体等，以助推统一的人民意志的形成。

因此，民主派面临的挑战是，要么抛弃民主的人民主权，要么展示民粹主义者的话语，误解民主制下人民统治的含义。第一个立场通常为那些更具精英主义倾向的民主辩护者所采纳。他们认为人民的统治是一个迷思，经验证实只有精英在统治，统治能力的缺乏也使人民的统治难以证成。在熊彼特看来，民主选举过程并非领导者作为代表被授权，而是领导者通过他们提供的克里斯玛或政策方案在招募选民。第二种选择不认为人民主权是纯粹的迷思，只是拒绝民粹主义者提供的特定解读，并且坚持民主制建立在平等之上。罗伯特·达尔区分了在现实政治中无法作为行动指导的民粹民主以及在现实中可能将人民主权和平等最大化的多头政体。

与古代混合制政体不同，现代政府的原理和形式建立在“统一”这一观念上，代议制政府一方面维持了人民主权的统一，但在政府的组成方式及权力如何行使方面却存在权力分立的分离形式，与统一性原则并存。代议制在赋予国家合法权威和政府权力实际运行两个环节同时发挥作用，这成为其内在张力的来源。民粹主义者要求人民的声音在政府中有直接的反映，但在当代政府中，人民的声音和

意志是以更为媒介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将政治重大事项通过公投等形式诉诸人民即时且一次性的表决，忽视了对行动背后的原因、动机和诉求进行更深入的描述，忽视了人民的意志始终处于开放性之中。面对离散、具备差异的选民个体，代议制的媒介力量也表现为通过政治动员促进有关公共利益的共识形成。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段德敏在发言中指出，要真正理解民粹主义，特别是民主与民粹的区别，就要摆脱狭隘经济主义的分析角度，突出“政治”维度，强调其自身的内在的重要性。

他认为，民主与民粹二者都认同人民主权原则，至少在语言上都以“人民”作为其行动的依据，党派和政治家们都竞相“为人民代言”，二者之间的区别很难清晰地界定。在经济主义盛行、利益分析视角居主导地位的今天，这一困难尤其显著，因为民粹主义可以被看作某种利益诉求比较激烈的表达，它和其他更“温和”的利益诉求表达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正因如此，有很多从“左右之争”的视角分析民粹主义的努力。无论是左还是右，如果它过度激烈就导向了民粹主义，但怎么才算“过度”却并不清楚，因此正好符合将民粹看作“标签”的观点。至于左右之争，涉及的最主要问题无非是分配问题，尤其是经济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而认同问题也经常以各种方式被卷入这种争论中。从根本上说，这是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和庸俗版马克思主义共同分享的缺点，即将经济看作政治分析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政治被降为第二等重要的位置，被认为完全是经济和利益关系的后果和衍生物。

从政治的视角理解民粹主义，即要强调政治有其自身的价值和重要性。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哲人那里，“政治”即“涉及城邦之事”，从而与只涉及家庭的“经济”之事区分开来。在西方古典语境中，“政治”首先指向“谁统治谁”以及“如何统治”的问题。今天，涉及民粹主义的问题，虽不可能照搬亚氏的观点，但仍可以从“统治的形式”入手进行分析。人民是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但谁又是人民？每一个人都是人民的一部分，但谁又能说自己真的是在统治？人民是唯一的主权者，但主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用勒弗的话来说，这种矛盾和不确定性正是现代民主问题的发端。

民粹主义者经常认为自己表达的是“真正的人民”的声音，是被体制长期忽视或压制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因此，民粹主义者并不认为选票可以表达“大

多数”人的声音。当选举的结果有利于民粹主义政治运动时，它是可以接受的，否则，要么是体制本身的力量歪曲了选举结果，要么“真正的人民”未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典型的民粹主义者的角度看，人民的胜利就是其所倡导的政治运动的胜利。这里的“人民”其实是一种充满道德意味的构想，它先预设一个“正义”的立场一如大规模减税、排外、反多元文化，然后根据这种立场来判断“真正的人民”的声音是否得到表达，至于人们通过投票表达出的看法，则一概是次要的。而从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内部来看，其领导人的主张又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民粹领袖一般具有权威人格，在其组织内部说一不二。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民粹主义政治的内在需求，即它要表达的“人民的声音”必须是单一的、没有丝毫的内在冲突和分裂，所有与它有些微不同的声音都会被看作是反人民的，因而也是非正义的、需要被消灭的。

虽然民粹主义反精英、反体制，是对传统代议制民主的一种挑战，但民粹主义本身并不真的反精英，更不反对政治代表。事实上正相反，民粹主义需要一个具有英雄色彩的领袖来“代表”人民，替人民发声。在传统的代议制政治中，每一位代表都声称自己才是人民的真正代表，但他们并不会认为其他代表是无效的、不正当的或应该被彻底清除的。从整个政治过程看，代表和人民（即被代表者）之间存在一个可见的距离，每位代表都从自己的立场和视角出发解释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善”，从而提供自己版本的对人民的代表，但他们永远无法对“公共善”的实际内容作完全排他性的占有。事实上，正如勒弗所言，这种代表与被代表之间的可见距离，正是现代民主的最基本特征。

在民粹主义政治中，“人民”被看作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在分裂的道德整体，这意味着民粹领袖和人民之间的代表关系也是特殊的。充满不确定性的选举通常给被选出的“代表”以一定的“使命”，它使得代表的正当性和权力范围都要受到限制。但民粹主义更经常地将代表视为被代表者（人民）的直接“体现”，如同前者即是后者的“化身”。在这个过程中，选举的重要性被大大降低，同时代表者（民粹领袖）与被代表者之间的距离也基本被取消。换言之，民粹领袖与人民之间被看作是完全等同的，前者的意志即人民的意志，反对他（她）就是反对人民本身。正因为此，民粹主义虽号称反精英，却更容易产生不受限制的“精英”权力；它虽然也常以反对国家建制的面目出现，却反而更容易扩大国家权力。当

代政治理论家娜蒂亚·乌碧娜蒂曾就这一点评论称，“民粹主义不会导致反国家的后果，正好相反，它会为国家主义的大规模扩张准备温床。”

六、民粹主义的政治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张继亮的发言聚焦民粹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纠葛。

民粹主义现象虽然在世界范围内非常普遍，但人们对其概念并没有形成共识。穆德和科尔特瓦瑟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弱核心的意识形态，认为社会分裂为两大同质性且对抗的势力——‘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政治应是人民公益的表达。”这一定义一方面缺乏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即民粹主义者常常声称社会处于政治、经济与文化危机中，以此来动员人们；另一方面，它忽略了民粹主义者通过排除“种族、宗教以及性少数群体”等“外群”来构建“人民”的面相。如果将危机和“外群”两个要素加入上述定义中，就得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定义：民粹主义是一种弱核心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社会分裂为两大同质性和对抗性的势力——“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及“外群”。其中，“腐败的精英”的不正当统治以及“外群”的侵入使得社会处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危机之中。为了解决这一危机，“纯粹的人民”需要在特定领导者的领导下结束“腐败的精英”的统治或将“外群”排除在社会之外，并且按照各种直接民主的方式来实现公意。

自由民主的概念比民粹主义更复杂。较为通行的是罗伯特·达尔的界定：“多头政体在本质上是大众化、自由化的，具有高度包容性，并且广开言路，允许公开讨论。”可以看出，自由民主政体是建立在多数决定与少数权利结合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结合实际上是不稳固的，而民粹主义正是试图用自由政体中的民主面相压制自由面相。

从积极作用方面看，民粹主义会加强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面相，通过各种方式促进民主参与。自由民主政体往往自动预设了充分的包容性，但这一预设并不成立，因为公民参与的权利与参与的能力不是一回事。当人们只是拥有形式上的参政权利而缺乏行使这些权利的意愿、资源、能力以及社会网络时，他们并不能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自由民主政体实质上的包容性无法得到保证。相反，它只对那些具有参与意识以及拥有充分参与资源的少数公民以及与他们自身利益迫切

相关或他们认为重要的议题具有回应性。自由民主政体的包容性日渐趋于精英化。

作为对上述倾向的回应，民粹主义者通过以下策略将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的群体纳入到政治领域中，努力恢复自由民主政体的民主承诺。一是替那些被建制派精英忽略的群体表达他们的观念、利益与价值观；二是动员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的群体直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从而将他们有效地整合到政治领域中；三是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方式将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的群体关注的政策主张纳入到政策议程之中；四是促使那些未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的群体所偏爱的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通过以上方式，民粹主义者可以确保被建制派精英忽略的群体的利益、观点、价值得以被包容进政治领域之中，从而有效地纠正自由民主政体缺乏回应性的精英化倾向。

从消极作用方面看，民粹主义也会危及自由民主政体的自由面相。主要表现为：民粹主义的主张是一种压制少数人权利的反多元主义主张；民粹主义者会利用人民主权来终结宪政、法治、分权等诸多制度约束；民粹主义者在执政之后会做出更多不负责任的决定；民粹主义的极端化倾向会动摇自由民主政体的稳定性。

从理论层面看，由于自由民主同时包含了两个不同逻辑的面相，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出发强调两个面相中的不同方面。拉克劳和墨菲等左翼思想家关注的是如何让被排斥的群体参与到政治领域中，他们看重民粹主义的参与面相所具有的重要意涵，所以他们认为民粹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兑现自由民主政体承诺的希望而不是威胁。相比之下，盖尔斯敦和塔格特等自由派思想家则更多地强调民粹主义中的反多元面相，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将它视为对自由民主政体的威胁。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马华灵的发言题目是《民粹主义的政治光谱》。他认为，西方学术界对于民粹主义的四种最有影响的定义都存在缺陷。有必要探索一种新的民粹主义定义，即最低限度的民粹主义定义。基于此，民粹主义将被分为薄民粹主义和厚民粹主义。

西方学术界最有影响的民粹主义定义是意识形态路径的民粹主义定义，其代表人物是穆德和卡尔特瓦塞尔。他们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薄意识形态，有两个核心内容：一是整个社会被划分为两个对立群体，即“纯洁的人民”和“堕落的精英”；二是政治应该表达人民的公意，民粹主义本质上是反精英主义和反多元主义的。这种定义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简化了民粹主义的复杂性；二是薄意识形

态概念具有内在的不一致性。

政治话语路径的民粹主义定义代表人物是拉克劳，他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话语，核心要素是关系。民粹主义是一种人民与敌人的对立关系所建构起来的人民主体性话语。而人民与敌人的对立关系是通过把个别要求聚合为整体要求的等价链建构起来的。这一定义有两大缺陷：一是过分宽泛地理解了民粹主义，以至于民粹主义这个术语变得毫无意义。二是定义强调的是民粹主义自下而上的建构过程，但在实践中，民粹主义既可以是大众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也可以是领袖自上而下的政治策略，甚至两者皆有。

魏兰德建构了民粹主义的政治策略研究路径。他认为民粹主义有三个核心内容：第一，民粹主义的统治者类型是个人领袖；第二，民粹主义的权力基础是大众的支持，民粹主义领袖为了赢得权力必须借助大众的力量；第三，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是领袖与人民的直接联系，而不是借助任何中介。基于此，他认为民粹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有显著的区别。然而，这一路径依旧存在不足。第一，狭隘地理解了民粹主义；第二，狭隘地理解了领袖与人民之间的联系；第三，狭隘地理解了人民的概念。

奥斯蒂盖的社会文化研究路径提供了民粹主义的第四种定义。该定义建立在奥斯蒂盖所谓的二维政治空间基础之上。这一空间有两条轴线，纵轴线是高低轴，横轴线是左右轴。高低轴代表着高级与低级，分别指代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左右轴代表着左翼与右翼，即在民粹主义的政治光谱中，既有左翼民粹主义，又有右翼民粹主义。根据这两条轴线，奥斯蒂盖的二维政治空间可以分为四个象限：低级—左翼、低级—右翼、高级—左翼和高级—右翼。这一研究路径有三项缺陷：第一，把人民等同于大众，忽略了大民众概念的弹性与抽象性；第二，为了能够量化民粹主义，奥斯蒂盖简化了民粹主义的对立关系；第三，社会文化路径实际上是一种可量化的政治策略路径。

尽管上述四种定义存在缺陷，但“薄属性”应被视为民粹主义定义的核心要素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民粹主义概念并不具有独立性，它通常需要跟其他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结合。在这个意义上，最低限度的民粹主义定义主张，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个“薄概念”。作为“薄概念”的民粹主义无法给出民粹主义的所有特征，只能给出它最核心的特征。此外，这一定义仅仅基于所有民粹主义共享的普

遍特征，而不包括某些民粹主义所分享的个别特征。

综上，最低限度的民粹主义定义认为，民粹主义可以分为薄民粹主义和厚民粹主义。薄民粹主义是所有民粹主义都共享的内核，具有两个核心特征：一是民粹主义是道德高尚的人民与道德堕落的敌人之间的对立关系；二是民粹主义者自称是人民意志的排他性代表。厚民粹主义实际上是民粹主义的内核和民粹主义的外围相结合的结果。在西方民粹主义的政治光谱中，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是两种典型的厚民粹主义。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徐晓红在发言中对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背景下的西欧民粹主义进行分析。她认为，西欧国家本没有强烈的大众民粹主义传统和基础，其制度体系多为顶层精英设计和引导的结果。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大规模移民及由此产生的移民问题、移民政策转型等结果的显现，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开始兴起，其主张主要针对外来移民和政府的移民政策。多元文化主义作为西欧多国处理移民问题的主要政策导向，成为民粹主义政党的批判目标。在这种背景下，西欧的民粹主义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基于社会文化和身份认同议题提出主张；第二，与极右翼政党紧密结合；第三，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民粹主义已成为多元文化主义主要的批判力量之一，虽处于上升趋势，但未来能否进入主流政治仍未可知。

七、欧洲民粹主义政治比较分析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钟准的发言题目是《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对外政策影响：政党制度的比较视角》。他指出，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刺激了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他们普遍持反全球化和本土主义的对外主张。民粹主义政党可以通过参与执政、议会竞争、选举和公投动员等方式影响本国对外政策，而政党制度是决定民粹主义政党对外政策影响力和影响方式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欧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较大内外部压力，各国主流政党无法解决这些难题，遭遇代表性危机，民粹主义政党正是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在国内政治中崛起。目前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对全球化与区域化的逆反回应出现，左翼民粹主义政党也对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持怀疑态度。

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影响本国对外政策的方式各不相同。右翼方面，意大利北方联盟、奥地利自由党、瑞士人民党都曾在冷战后成为本国联合政府的正式成员，

获取影响对外政策的关键职位。荷兰自由党、丹麦人民党虽然不是正式的联合执政党但支持本国的联合政府。法国国民联盟、德国选择党则一直反对本国的执政党，他们通过议会竞争和动员选民投票的方式发挥影响。左翼方面，希腊极左联盟已经领导过政府，意大利五星运动已经与北方联盟联合执政，西班牙“我们能”党在是否加入联合政府的问题上摇摆不定，德国左翼党则并不谋求执政。上述差异与各国政党制度的不同特点有关。

按照韦伯的理想典型，西欧政党制度可分为极端多党制、温和多党制和相对两党制三类。

意大利的极端多党制和政党力量的分散化，给了民粹主义政党更大的活动空间。由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联合组阁的意大利新政府被认为是西欧首个民粹主义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两党都对意大利所承担的欧盟和国际义务持怀疑态度。两党联合执政协议承诺将采取削减税收、促进福利支出、设置最低工资等讨好民众的政策，并以最坚决的态度打击犯罪和非法移民。与欧盟关系最大的外交和经济部长职位，仍由主流的一体化支持者担任，北方联盟领导人萨尔维尼和五星运动领导人迪马约分别担任内政部长和劳工部长。这说明民粹主义政党仍然将主要精力放在内政而非外交上。

民粹主义政党在温和多党制的德国崛起，与主流政党应对债务和难民危机不力且政策主张越发趋同有关。与意大利的民粹主义政党类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对外关系上同样反全球化、反欧元、反伊斯兰，迎合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部分民众。尽管民粹主义政党的议会席位大大增加，但在温和多党制下其执政前景仍然受到很大限制。2018 年联盟党和社民党再次组成“大联盟”政府，将另类选择党排除在联合政府外，后者的对外政策主张仍无法直接左右德国外交决策。不过，作为联邦议会中的最大在野党，另类选择党能够影响德国相关对外政策特别是在欧盟问题上的预算。同时，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民意，这可能成为制约默克尔政府对外政策的社会因素。

英国两党制具有鲜明的共识政治特点，保守党和工党在对外政策上同样有较多共识。相比意、德、法三国，民粹主义政党在英国影响力较小。最大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独立党如其党名，是典型的单一议题政党，即反对欧盟。该党曾一度在 2015 年大选中成为第三大党，并在 2016 年脱欧公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接

影响了英国对外战略的走向。然而，在 2017 年英国大选中，该党失去了其在议会中的唯一席位。英国独立党的外交主张如尽快彻底脱离欧盟、取消对俄制裁等与主流共识差距较大，而在两党制下，第三党还面临着与两个大党的激烈竞争。

在欧洲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每个政党都有强大的动机去讨好国内某一特殊群体和利益集团。与传统主流政党相比，民粹主义政党的对外政策偏好更具偏向性。但同时，从极端多党制，温和多党制到相对两党制，随着政党力量分布的集中，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对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影响力是递减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陆屹洲基于欧洲国家的宏、微观数据，分析了为极右翼政党投票的群体。

他表示，目前学界对极右翼政党崛起的解释主要集中在外来人口、政治信任、经济危机和文化心理四个方面，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维度，总体上囊括了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当今欧洲极右翼政党的表现还是接二连三地出人意料，既有的理论难以解释一次又一次的黑天鹅事件，解释力的缺陷很可能源于研究方法的不足。因此，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在于将既有解释中的关键变量纳入一个兼顾宏观和微观的综合性模型，同时在不同国家的情境中对其进行检验。

首先，考察极右翼政党崛起的宏观因素，探寻国家层面的各种指标和该国极右翼政党真实得票率之间的联系，回答“哪些因素会促进极右翼政党的崛起”。其次，考察极右翼政党崛起的微观因素，探寻个体层面的不同因素对其投票行为的影响，回答“哪些人会为极右翼政党投票”。最后，探寻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尝试解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什么样的人会为极右翼政党投票”这一复杂问题。宏观层面设定因变量为得票率，自变量为外来人口占比、失业率、清廉程度。微观层面设定因变量为投票行为，自变量为包容外来人口、收入感知、政治信任、心理特质，外加控制变量——社会人口学特征。数据基于世界银行、透明国际、欧洲统计局等公开资料，样本涵盖欧洲 12 个国家的 14 个极右翼政党。通过数据分析和统计图示、Logit 回归模型、广义多层线性模型等研究路径，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极右翼政党的支持者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来自底层、未受过良好教育、相对年轻的男性更容易为极右翼政党投票。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收入对投票行为的影响表现得不那么稳健。这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重要的并不是选民自身的境况有多窘迫，而是他们将这种境况归因于何处。与此同时，不同个体对收入的期望、不同国家的经济水平和贫富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收入对投票行为的影响。对于投票行为而言，具体的排外态度比笼统的政治信任表现出了更为稳健的影响力。

其次，单从国家间的比较看，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与极右翼政党的支持率存在一定联系，失业率更高、更为腐败的国家更有利于极右翼政党的崛起。然而，相关定量研究又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观点提出了质疑。一是宏观因素和极右翼政党支持率之间的关联程度并不算高，大致处于中等水平。二是广义多层线性模型表明，宏观因素并没有直接作用于个体的投票行为，而是部分表现出了对微观因素的调节作用。因此，严谨地说，大多数既有的宏观研究仅指出了有较大可能影响极右翼崛起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在极右翼政党崛起过程中的传导过程和因果机制无疑值得学界继续努力。

第三，作为一种探索和尝试，研究中为极右翼政党引入了两个不太常见的政治心理学变量。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的模型都确证了支持公平与投票行为间的负相联系，这一联系在部分国家的样本中也表现出了显著意义。与之相反，没有发现拒斥变革影响投票行为的证据。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极右翼思潮具有一定的心理根源，并且和传统右翼思潮存在分野。传统右翼思潮扎根于对现有不平等的接纳和对变革的拒斥，这两种心理满足了保守主义者管控不确定性与恐惧的强烈需求。然而分析结果却表明，极右翼思潮和传统右翼思潮仅仅共享了对平等的态度，在传统方面却没有达成一致。因此，对于不平等的接纳使得部分个体产生了种族或民族优越感，进而发展出排外主义。在排外主义的旗帜下，极右翼政党同时吸引了拒斥变革和支持变革的两波选民。前者对于外来人口带来的变化感到不适，期盼回到本土民族组成的同质性的传统社会，后者则认为外来人口已经让当代社会千疮百孔，寄希望于剧烈的变革来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王英津基于法律、理论与现实三重视角对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公投进行了解析。她表示，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的一个高度自治区，由于与西班牙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民族与经济关系，当地的自治诉求一直高涨，并逐渐演化为分离诉求，最终激发了2017年的分离公投。

然而，加泰罗尼亚公投是合律性和正当性双重缺失的产物。就与现行法律的

契合度而言，公投既违背了西班牙宪法又不符合国际法的自决权原则。加泰罗尼亚地区实行高度自治的主要法源是 1978 年《西班牙宪法》和在 2006 年修正过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条例》。西班牙是单一制国家，其地方自治权系中央作为“主权代表者”通过宪法授予的，既然如此，自治权就不能超越宪法。从宪法规范看，加泰罗尼亚并没有从西班牙王国中分离出去的权利。

就与学术理论的契合度而言，加泰罗尼亚公投在西方“分离权”理论、社会契约学说和民主公投理论三个领域均无法找到合理性依据。首先，西班牙中央政府并没有残暴地虐待或屠杀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民众，相反还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推行民族保护和民族自治的政策，因此加泰罗尼亚并不具备行使“道德分离权”的条件和情形。其次，按照近代西方的社会契约学说，契约理论强调契约自由，其中包括签订契约自由和解除契约自由。然而，加泰罗尼亚却对解除契约的自由存在误解，或者说夸大了解除契约的自由程度。加泰罗尼亚的认知错误在于，将契约自由片面地理解成签约自由，仅仅注意到了签约时需要与其他签约方进行协商，各方达成合意后组建一个国家共同体，却忽视了解约时也需要与其他签约方进行谈判，只有获得其他签约方的一致同意后方可自由退出。第三，从理论上说，此次公投是民主性公投而非自决性公投，作为一种地区民主性公投，其表决议题只能限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内部治理的事项，而不能就整个西班牙的领土主权变更议题进行表决。倘若要决定后者，其就需要与作为共同领土主权所有者的另一部分人民（即西班牙其他行政单位）或西班牙中央政府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

尽管公投暂告失败，但仍给各个存在分离问题的主权国家提供了经验与警示：其一，过度放权并非解决分离主义的灵丹妙药，需要把握好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平衡。其二，分离主义的发生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水平没有直接关联，欠发达国家不能把解决分离主义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上，多管齐下才能产生更好效果。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凯旋对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进行了透视性分析。他认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民粹主义政党在意大利一直是重要的政治力量，这与该国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和主流政党的合法性危机密切相关，而民粹主义本身的诱惑性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民粹主义政党的每一次强势兴起，都推动了意大利开启政党政治重组和政治文化转型的进程。当前，意大利

主要民粹主义政党虽支持率颇高，但其未来的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能否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能否在“主流化”与“反建制”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八、欧洲政治变革与中欧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刚探讨了欧洲新民粹主义的场域差异及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他认为，中东欧国家的新民粹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表现和特点不尽相同，在中欧地区与巴尔干地区的差异性尤为明显。不能简单地认为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是传统民粹主义的回归。

与西欧新民粹主义政党强调种族间差异、反对外来移民、主张排外主义等不同，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在这些方面的诉求较弱。它们主要强调“去共产主义遗产”下的社会公正与平等，排斥的大多是散居在国内的族群（如罗姆人、犹太人等）。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既没有政治光谱上的定位，也较少有“与众不同”的政策标识。因此，学界一般根据对议会民主制度对抗程度的强弱，将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分为温和派民粹主义和强硬派民粹主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缺乏明确和一致的政策内核，民粹主义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界线是变动的。此外，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是一个大杂烩，具有“超越左和右”的性质，很难将它们等同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转型 20 多年来，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日益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新民粹主义的差异性即是表现之一。考察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既离不开转型的背景，也是对转型的一个深入解读。

第一，不能简单地认为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是传统民粹主义的回归。中东欧新民粹主义呈现出与前两代民粹主义完全不同的一些特征：不是反对民主而是反对自由主义；不再主张作为人民的精英来带领人民取得政治成果，而是主张反对精英政治、反对专家治国；部分新民粹主义政党具有强烈的仇外情绪以及超越于选举之外的街头运动等倾向，但仍在民主政治体制框架内活动。

第二，不能简单地判断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是短暂的现象。新民粹主义政党自身存在一些诸如内部分化、领袖个人高于政党、领导人继承难题、支持者年轻化和易摇摆等方面的困境，影响和制约着它们的发展。但是，由于中东欧传统政党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日益趋同，它们面临新的经济环境时的束手无策，自身形象

（如腐败）的损耗以及新媒体对传统政党活动模式的冲击，都使得新民粹主义政党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选项。

第三，中东欧新民粹主义的兴起不能简单地判定为“入盟后综合症”。转型后中东欧一些国家出现了新民粹主义现象，但并没有上升为主流政治，经济上更没有转向民粹主义。入盟后这些国家普遍出现的社会新贫困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问题此起彼伏等现象为新民粹主义政党“讨伐”传统左右翼政党进而获得更高的选票提供了机会。应该认识到，“民粹化现象”是中东欧国家转型期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在不同阶段其诱发原因也不尽相同。

第四，从政党政治的发展逻辑看，现代民主政治的多样性特征日益明显，新民粹主义政党作为体制内的一种选择加深了这种多样性，在挑战传统左右政党的同时也会推动其自身革新的步伐。不可否认，极端民粹主义是现代民主政治所排斥的，但不能简单地认为新民粹主义及其对民主的可能挑战就是一种否定的现象以及民主的倒退。

欧洲新民粹主义的发展态势必然对中欧关系和“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影响。首先，在左、右翼民粹主义的夹击下，欧洲主流政治保守化与右倾化趋势正不断强化。未来几年，以本土主义为特征的民粹主义将会成为欧洲内的主流氛围，中国在欧洲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阻碍会明显加大。其次，民粹主义的得势会使欧盟趋于保守和内向，加剧“意识形态对抗”，使中欧身份异化现象更加严重，影响彼此的政治互信。

中国海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弓联兵认为，当前匈牙利执政的新民粹主义政党联盟表现出强烈的欧盟怀疑论，却积极推进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就“一带一路”建设而言，匈牙利新民粹主义政党执政有助于中匈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合作。由于“一带一路”符合青民盟政府的东向政策，匈牙利一直对“一带一路”回应热烈，两国经贸合作得到快速提升。

匈牙利疏远欧盟实施“东进”政策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固然有积极影响，但在匈牙利依然是欧盟成员国的情况下，反对党匈牙利社会党和在野党绿党依然支持欧洲化政策。社会党在东欧剧变后，将建立西式民主作为目标，并且为了摆脱共产主义的“包袱”，反对与共产主义政党合作。绿党更是将更加民主的欧洲和绿色的经济与社会作为目标，在对待欧盟问题上与执政联盟观点相左。因此，

匈牙利处理好与欧盟以及邻近国家的多边关系，对于营造良好的地缘政治、维护匈牙利政局稳定都有积极意义。同样，这对于匈牙利发挥好“欧洲心脏”的辐射作用，拓展“一带一路”在中东欧乃至欧洲的合作也有着积极影响。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张飏在发言中对英国脱欧与民粹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英国脱欧常被认为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胜利，并且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并被视为是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挑战。从表征政治的角度看，“英国脱欧代表民粹主义的胜利”是一个典型的表征。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民粹主义表征倾向于把脱欧看成是欧洲和北美“民粹主义浪潮”的一部分；二是民粹主义表征倾向于关注人民和精英的对立；三是民粹主义表征倾向于把脱欧看成是反移民；四是民粹主义表征带有将政治家描绘为煽动者的含义，以及将选民塑造成本土主义者和全球化的失败者。

然而，民粹主义表征也存在很多问题。第一，时间框架明显偏短。民粹主义表征大多和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有关。相较于其他表征，民粹主义将脱欧追溯到 2016 年前后，然而英国脱欧并不是一个短期问题。第二，忽略了英国脱欧势力的跨政党性。民粹主义表征倾向于将英国脱欧归功于独立党，忽略了英国保守党几乎大部分要员都身处“投票离开”的造势阵营中。此外，英国脱欧势力还包括工党成员。第三，从投票来看，英国的民众并不是被煽动起来的丧失理性的本土主义者。正如迈克·考克斯所言，英国脱欧的问题是使大部分对脱欧失望的学者将选民视为无知、反智识、非理性、易冲动的群体。

脱欧的民粹主义表征也具有相当程度的误导性。首先，诱导人们认为脱欧是近期民粹主义浪潮的一部分。但有观点认为，英国脱欧是自 1992 年以来英国和欧盟不融洽关系的一个爆发。脱欧不是民粹主义或者全球化的结果，而是英国传统身份、认同和欧陆国家一直存在着张力。此外，英国脱欧后不仅不会反对全球化，而是会在（经济）全球化方面越走越快，这和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尽管英国脱欧有民粹主义的诉求且和欧洲大陆及北美的民粹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其本身是更为长期、寻求更为开放自由的经济的事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永强的发言聚焦新保守主义回潮博弈中的波兰对外战略。

自法律与公正党执政后，波兰对外战略的整体进程逐步趋向于强化自身的战

略优势构建，并逐步明确其在中东欧事务和欧洲事务中的作用发挥。新保守主义在欧洲的回潮，对于波兰的影响也随之得以彰显。杜达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更多地表现为在强化对美关系的同时，有效优化波兰在中东欧地区的战略优势。

尽管新保守主义回潮对波兰对外战略的实施具有显著影响，但审视波兰对外战略实施时，还需关注波兰在对华关系领域的积极举措。中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为波兰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参与“16+1 合作”提供了可靠平台。波兰能够借助“一带一路”对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6+1 合作”的诸多进程，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

从波兰参与国际事务的相关视角审视，波兰持续强化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在安全领域强化与美国的战略性协作，并不影响它从与中国等国家的合作中获得相应收益。相反，随着波美关系提升及波中关系的不断落实，波兰可以借机获得来自中美两国的战略性支持，拓展它在中东欧乃至整个欧洲的国际影响。

综上，新保守主义影响下波兰对外战略未来将呈现以下趋势：仍将以波美关系为基础，逐步推进相应的战略方向。波美关系方面，继续作为美国在中东欧的坚定盟友，应对俄罗斯在中东欧的战略影响。对俄关系方面，波俄关系因东乌克兰冲突的久拖不决呈现持续对立的局面，而波美关系的持续强化与美俄两国在欧亚大陆的长期战略对立，客观上又影响到波俄关系的改善。波中关系方面，随着参与“一带一路”以对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6+1 合作”进程的有效推进，波中关系未来的发展将呈现更为乐观的前景。与欧盟关系方面，作为欧盟成员国，波兰一方面发挥着推动欧盟一体化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中东难民等问题上与更多西欧、北欧国家持续对立。与其他中东欧国家关系方面，借助新保守主义回潮，波兰对于中东欧国家的影响将随之提升，或将对中东欧事务发挥更大影响。

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强教授在论坛闭幕致辞时表示，经过两天的讨论，与会的中外学者加深了对民粹主义的理论思考，并对民粹主义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前景有了更深入的感知。从对古典的“人民”、“煽动家”等概念的溯源，到对现代“人民主权”理念的辨析，从对欧洲政治现实的数据解读，到对相关政策取向的深刻聚焦，这次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实现了对民粹主义、右翼政治和欧洲未来的全方位思考和审视。

编辑：兰旻

审稿：翟崑

终审：钱乘旦